

民俗学科建设报告书

董晓萍 朝戈金 黄涛 主编

民俗学科建设报告书

董晓萍 朝戈金 黄涛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学科建设报告书/董晓萍,朝戈金,黄涛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077-4078-3

I. ①民… II. ①董… ②朝… ③黄… III. ①高等学校—民俗学—学科建设—研究报告—中国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3098 号

责任编辑：方晓喆

封面设计：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保定金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87×1092 1/16

印 张：41.5

字 数：567千字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45.00元

项目来源与出版资助

温州大学“558”学科建设工程民俗学“重中之重”学科建设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211 工程三期项目“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与社会应用”

序 言：民俗学的独立建设与学科群的发展

董晓萍

20 世纪以来，在我国，从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世纪晚期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搜集和遗产保护，再到跨世纪的民俗学现代学校教育和社会公众教育，“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两门学科已逐步得到普遍认同。虽然民俗学的学科多数最初来自西方，但它和民间文艺学的定义与根基在中国，现在已成为中国“民众的学问”。进入全球化时期后，重视国家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国际思潮一再高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都受到了更高的社会关注。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办发布了学科调整目录，国内院校的“民俗学”成为“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民间文艺学”留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继续建设。处于当今开放竞争的氛围中，学科归属的变轨改制是开拓，也是挑战。至少，发生变动的学科要遇到远未终结的创新问题和磨合问题。从学科史和学术性质看，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在理论来源和学者构成上十分接近，学术团队属于同一个学术圈，在与周围二级学科群的联系上也有趋同取向，因此两个学科建设的科学性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共性问题，这点也比较特殊。从现代地位看，民俗学的能量大，国际化程度高；民间文艺学的水深，早有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民俗学升为显学，民间文艺学成为隐学。但是，这种地位的差异又有内外因素的影响，还不能做一时之论。从学术史上看，我国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曾

混合发展，后来才成为两个学科，因此两者还都有延伸内涵和学科独立性的问题，这也要在学科内部自己解决。当然，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中，这种学科融通的现象并不鲜见。学科化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在研究对象相近和理论基础相关的学科之间，找出不同分支的研究生长点，建立多元化的理论知识系统和研究方法，以解决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复杂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形势下，还迫切需要发展知识格局的多样性，提倡人才培养的多样性。因此，这两门学科的创新建设的价值和长远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应该说，经过 14 年的时间，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都已在各自的一级学科下，拓展了发展的空间。民俗学以精神民俗、物质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和语言民俗等广泛的民间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已得到更多的承认和重视。民间文艺学走入网络信息社会，产生了承续历史和放眼未来的蓬勃生机。钟敬文先生晚年致力于整体规划下的两个学科的分化发展及其理论发布和改革推进¹，已通过这些现实收获得到了逐步验证。

2011 年，国务院学位办启动了新一轮学科目录编制的工作，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专业的广大同仁，希望借此契机，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推进学科建设。这成为本书产生的实际背景。来自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负责人和学术骨干，站在为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高等教育改革献计献策的高度，回望过去、预测未来，包括总结成绩和不足，这种积极性通过本书，呈现为业内共有的心情和决心。

我们编纂本书的思路，不是写理论书，也不是写评估报告，而是踏踏实实地做调查，写学科建设现状报告。我们不去钻以往研究的框子，也不用外来模式干扰，也没有什么新奇的理论和方法，就是通过总结和交流，讨论如何发展民俗学科。实际上，从来稿看，各院校、各门类、各地区和各民族的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国内院校的民俗学科也正是在各种不同的学科条件下生存发展的。有些在中央院校看来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在地方院校或民族

1 关于钟敬文先生对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两学科布局的意见，参见本书《附录一》。

院校还要倒回去调查和思考；有些在国家社会重大文化建设中似乎已确定的社会应用问题，在民俗学科的学理上还要开展更基础的研究，设置更合理的研究方向。本书力主实事求是地梳理一些具有概括性的问题，然后做初步分析。

对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这种对象苍老而建制年轻的学科来说，学科建设的积极性是尤为重要的，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正是这样一种有积极性的学科。希望本书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国内院校同行的交流，也为各级科研主管部门了解民俗学科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提供正确的依据。

以下谈谈本书涉及的基本问题、工作过程和调研数据分析结果。

一、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分开建设

在我国高校正式建立“民俗学科”，是由钟敬文先生于197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提出的¹。对民俗学科来说，从理论研究到学科化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即民俗学研究与民俗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两个学科建设的关系。钟敬文先生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从事了大量的教育实践活动，这对在当时国内高校蓬勃兴起的人文社科群中将民俗学变成一门学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民俗学研究与民俗学科关系的界定上，钟敬文先生采取了整体历史观的态度。他认为，从教育体制上说，民俗学科建于新时期，但民俗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两者之间是不同步的。不过从整体历史看，民俗学研究是民俗学科成立的早期准备；而民俗学科得以建设，又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民俗学研究向社会应用延伸的结果，钟先生还主张将这种整体历程放到20世纪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去思考。

1 钟敬文先生于1979年3月与顾颉刚先生等倡议恢复中国民俗学会，同年8月1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提出成立“民俗学科”，详见钟敬文：《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在北京师范大学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的讲话》，《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第230—251页。另外，关于本文中“民俗学的独立建设”的讨论，详见董晓萍等主编：《新时期30年的北师大民俗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

在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关系的界定上，钟敬文先生在自己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先合后分的观点。他指出，在20世纪初，两门学科是混合发展的，甚至在早期民俗学的提法还要更多一些，民间文艺学的概念则是钟先生自己发明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方案，加上受苏联的影响，我国高校民俗学科的建设是以民间文学专业为发展方向的。在这一时期，钟先生以北京师范大学为阵地，以自己早年提出的“民间文艺学”为基础，吸收了苏联民间文学研究理论，同时也与他以前接触的日本民俗学和欧洲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等深层融会，进行综合建设。这一时期，他对民间文艺学的阐释产生了蜕变，主要是在对民间文学的概念和性质的提法上有了变化。他在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史理论的基础上，继续使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资料。1950年代至1960年代，他还借鉴苏联民间文艺学史的框架，以晚清民间文艺史料为对象，开辟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史和历史民俗学的新领域。然而，原本相关性很强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因为民俗学的部分研究对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冲突，民俗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叫停，未能与民间文艺学一起进入学科化的阶段。总之，在钟先生的表述中，民俗学所涵盖的民间文学研究部分在1980年代前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

这一时期偏重民间文艺学的倾向也明显地转化到学科建设中。在教育理念上，民间文学专业只招研究生，不招本科生，专门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研究生的生源从高校尖子生中选拔，毕业后分配到高校从事民间文学教学，或者分配到专业机构搞民间文学研究。这种高层专业化的教育理念和工作模式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在此期间，钟先生遭受了政治挫折，他所领导的教研室也几度解散，但这些都没有改变这种培养理念。在这种高端专业化的教育导向下，本专业的教育开口小，专业标准高，所培养的人才在中国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史学、哲学和外国相关理论上都要博而通，再进行中国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需要付出极大的辛劳，花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教学和手把手的训练，钟先生为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需要说明的是，在1950年代，钟先

生也接待过外国学者，但主要是苏联留学生和苏联驻华使馆的学者，在国别和人数上都屈指可数。而对这一时期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发展轨迹的不连贯的问题，钟先生宁愿用“历史的曲折性”加以表述。

1979年以后，钟敬文先生和国内许多人文社科界的前辈一样，回到高校工作。他在此后的著述中，都将在以往条件下建设的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描述为在发展阶段上有不同侧重点的整体学科。在随后的20年中，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科围绕钟先生的工作进行了许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尝试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作为两个研究分支进行建设，在相关高等教育理念上也发生了转变。

1991年，在民俗学的研究方向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后，经过钟敬文先生的观察，它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进入实证性更强的人文科学系统内发展，学科独立的条件日益成熟，他当年发表了《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一文，对此做了肯定¹。他后来又发表了《七十年学术经历纪程》和《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等文章，对50年代受苏联理论的影响的问题做了反思。在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关系上，他谈到两者有各自的规律，又能互补发展²。

钟先生以一人而兼治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这使他在两个研究分支的学科化上有很多共通的思考。一方面，他在对两者的理论表述和专业教育体系的构想上，会有很多互通性；另一方面，由于高校教学课程的分门体系和各门课程的特色化要求，他对这两种学科建设的必要性的表述又趋于相对差异性。因此，要对他的学术思想做出全面解释，还需要同时去看他所处时代的其他复杂因素在他的学科化表述上所产生的综合作用。

新时期民俗学科独立建设的结果，是产生了四种教育模式，即高层专业教育、地方教育、民族教育和普及教育。后来国内高校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也

1 钟敬文：《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2-9页。

2 钟敬文：《七十年学术经历纪程——〈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第1-6页。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12-17页。

都在这些模式中塑造和变迁。以下简要说明其内涵和做法。

（一）延续高层专业教育传统

在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层面，钟敬文先生一直坚持高层次的专业化人才教育理念和模式。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提高研究生导师的素质和生源质量，并为此发表了不少文章。1979年以后，我国迅速发展了本、硕、博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这也为钟先生所呼吁的博士生高层培养模式提供了条件。

钟先生培养博士研究生，始于国家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他注重借鉴国际同行高层专业教育经验，以外国较早建立的研究生多层培养体系为参照，呼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民俗学博士学位培养模式，建立国家级的博士学位人才规范标准。他还总结长期从事高校教育的个人经验，强调这种高层专业教育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他说：“十多年来，我们教研室培养了几届研究生，并不断接受着东西洋的留学生。……由于上述国内学界的形势和本校在这门学科中所处的位置，我们在感到荣幸之余，更深觉责任的重大，必须竭尽力量，才能不负国内外学术界的期望。”“民俗学建设的工程是巨大的。它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较长的时间。”¹1990年代，经他组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陆续刊登了一批文章，如《美国和加拿大高等院校民俗学专业及课程设置情况》和《欧美民俗学略说》等²，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进行的。

（二）开展民俗学的地方教育和民族教育

1994年以后，国内科研院所、地方高校和民族地区院校日益扩大民俗学教学科研的需求，根据这种情况，钟先生提出增加培养地方高校和民族地区的研究生与中青年师资。他还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生源，强调加强培养，应在招生条件上也适当放宽。北师大民俗学科对由这个渠道引入的研究问题十分关注，这使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向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青年学者共同

1 钟敬文：《民俗学特辑·前言》，1991年第2期，第2页。

2 董学艺：《美国和加拿大高等院校民俗学专业及课程设置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38—41页。阎云翔：《欧美民俗学略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第27—35页。另见〔日〕渡边欣雄，朱丹阳译：《在中国民俗学会讲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22—24页。

培养的方向拓展。对于地方高校和少数民族出身的研究生，钟先生鼓励他们在本地区和本民族民俗研究方面发挥作用，成长为民俗学的一颗种子，生根发芽。地方高校或少数民族青年学者在回到本地区或本民族的研究领域后，大都承担了中央院校或汉族同仁所不能承担的课题，做出了一定的学术成绩。

（三）提倡面向社会公共事业的民俗学普及教育

80年代中期以后，新中国民俗学运动蓬勃发展，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整理工程迅速推进，这一时期钟先生发表了《民族传统文艺的巨大作用——在民族传统文艺十套集成志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编纂地方民俗志的意义》等文章。根据他的指导，高校民俗学教育成果应服务于国家社会的重大文化需求，开展民俗学普及教育。他指出，近年我国不少省市开始编纂地方民俗志，并出版了著作，它们与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在一起，成为民族民间文化的巨大长廊¹，为此，应提倡民俗学的普及教育。他率领北师大民俗学科举办了多届民俗学讲习班，开办了各种专题讲座，吸收地方文化团体骨干到北师大民俗学专业学习。在他的倡导下，北师大和各地民俗学科增加了对新时期民俗、民间文艺搜集整理运动的参与。

民俗学科教育理念的转型，确保高层专业化教育的制高点，也重视发展民俗学的地方教育、民族教育和普及教育。它产生了三种结果。一是从制度和学理上，促进实现了民俗学科独立发展的目标。从民俗学科的角度说，承接历史传统和符合现实需求的建设，壮大了民俗学，也巩固和补充了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科的独立发展，因为具有对现代化社会运行的更大适应性，还进入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开展跨文化对话，大幅度地提升了研究空间。这也为民间文艺学带来许多新课题，使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双赢。二是发展民俗学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交叉研究。而在与相关学科群的交流与融合中，在带有各自特征的独立学科的同步建设中，民俗

¹ 钟敬文：《民族传统文艺的巨大作用——在民族传统文艺十套集成志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1—3页。钟敬文：《编纂地方民俗志的意义——〈绍兴百俗图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第36—39页。

学科的定义和特征也逐渐明晰。三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思考民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民俗学的地位、功能和趋势,民俗学的现代知识体系、民俗学搜集民俗和研究民俗的方法论的启示性等,这些都是十分扎实和具体的专业问题。民俗学科的发展经历了这些步骤,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高度。这些改革对国内其他院校的民俗学科建设都具有指导意义。

二、民俗学在学科群建中发展

1990年以后,钟敬文先生提出将民俗学放到学科群中发展,并很快完成了个人对民俗学理论体系的全面搭建。他的民俗学构想是一个大框架,里面有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民间艺术学和民俗文化学,形成一个学科群。钟先生在这方面的著述对国内院校的民俗学科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民俗学二级学科的建设说,同时从本书所涉及的学科建设情况看,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民俗文化学一直联系紧密。在此,需要对一些相关问题略作讨论。

(一) 民俗学

在国内院校民俗学科正式成立后,马上面临着拿出民俗学的理论体系和编纂民俗学高校教材的问题。1998年,钟敬文先生主编并出版了《民俗学概论》¹,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对《民俗学概论》的学术价值,研究的文章已经不少²,在此无须多谈,这里仅谈谈另一篇不大容易与之联系起来的钟敬文先生的理论文章,即前面刚刚提到过的《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³。

在《民俗学概论》出版前,1991年,钟敬文先生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

1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后高教社出版了此书的修订版,参见《民俗学概论》(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仅以《民俗学概论》研究为例,参见重庆炳:《高质量、高水平的厚重之作——评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34—35页。

3 钟敬文:《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2—9页。关于此文产生的经过,参见该文末的《作者附记》。

他在提出成立民俗学科之后，向高校师生提供的第一份理论系统大纲。同时也是一份教学大纲，他本人就曾使用它在中国民俗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做过试讲。

他提出，民俗学的结构分为六方面，包括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和民俗资料学。他对这六方面的命名，是对民俗学理论体系内的支柱性观点的搭建，也是他创用的第一批教学科研基本概念。这些核心观点的表述和概念，后来被他用作博士生专业课的名称，如“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他本人还担任了此课的主讲，曾经连续多年亲自给他指导的博士生授课。这门课现在成为北师大民俗学科博、硕研究生的必修课。其他大部分概念后来被北师大民俗学科的中青年教师用作基础课和学位专业科的课名，如“民俗学原理”、“民俗志”和“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概念也成为国内同行使用频率极高的专业术语。

他提出民俗学可按三个分支方向发展，即理论民俗学、历史民俗学和民俗志学（即此文中的“方法及资料的民俗学”）。这种设计，因为被实践证明符合民俗学教学科研的规律，近年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其他一些院校中，已成为民俗学研究生的招生方向和理论研究的新分支。

（二）民间文艺学

钟敬文先生在1936年提出“民间文艺学”的概念，到了1991年，他已更有信心把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科分开建设。实际上，这时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民间文艺学，民间文艺学的独有特征也更加突出。

1991年，许钰在北师大学报专栏上发表文章，题为《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此文的特点是对我国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曲折关系做了科学分析。他重申钟先生“我国民间文艺学在‘五四’时期和二三十年代是同民俗学混合在一起的”的观点，不过他也以自己的说法提出了民间文艺学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立学科化的理由。他说，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我们认为，只要以各类民间文学为对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学术活动，就属于民间文艺学”。他还在民俗学已经独立之后，将再次提出的民间文艺学独立学科化

的效果做了分析，指出：“这一分立不涉及民俗学领域的广狭，它是在民俗学之外另辟蹊径，从文艺学着眼，把民间文艺学作为一般文艺学的一个特殊的分支。”¹

按照许钰所说的这种布局，把民间文艺学划归中国文学理论，但要强调民间文学是文学中的特殊文学，应该进行特殊文艺学的研究。把民俗学划入社会文化理论范畴，朝着新方向发展。而民俗学本身的范围，不管是广义的，包括民间文艺学，还是狭义的，不包括民间文艺学，都是民俗学的问题，它不影响民间文艺学的独立建设。

如果我们将钟敬文先生 1990 年代完成民俗学的理论体系和教材建设后的思想变化纳入进来，再看许钰此文，就会对我们的理解有新的帮助。民俗学科自 197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快速发展，钟敬文先生经过内部观察，又吸收国外同行的学说加以比较，加上分析业已到来的全球化思潮，他发现，两个学科的各自独立发展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它们在现代知识结构、研究对象和未来趋势上，都已彼此不能包办，再将它们混合建设，像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会对两者都造成束缚。

在民俗学当时已经红火的情况下，钟敬文先生又在考虑把民间文艺学留在中国文学学科内的命运。1996 年在一篇题为《谈谈民间文学在大学中文系课程中的位置》的文章中，他这样描述道：“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间长期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应在中文系课程中开设这门课程。同时，由于它区别于文艺学和作家文学的特征，也不能将之与文艺学、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课合并。”² 他在这里对民间文艺学区别于其他中文学科的阐述，使用了“民族文化”的概念，这就等于指出，民间文学所拥有的民俗志背景和文化诗学的方法论，是其独立性的依据，而这个概念他以往是很少使用的，现在做了特别的强调。此前他是将民俗与民族文化相提并论的，现在

1 许钰：《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第 14—18 页。

2 钟敬文：《谈谈民间文学在大学中文系课程中的位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6 期，第 61—65 页。

他也对民间文艺学做如此界定，从实践上说，这是帮助民间文艺学在中文学科中提升排位，也让民间文艺学借民俗学的势。再从他的学科群建设观点看，他反观民俗学科建设的成绩，也对民间文艺学产生了理论表述上的变化。这时他的目光更长远，能更明确地指出，民间文艺学科应该如何设置、如何发展，而不仅是民间文艺学的学理本身应该怎样讨论。

（三）民俗文化学

民俗学与我国其他现代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其他新学科有很多交叉关系，这是一种学科群的概念。在新兴学科群中，民俗学既具独立价值，也往往与其他相邻学科界限不清，为此，在民俗学科的建设中，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将民俗学历史价值化，使之呈现本土传统，能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扎根；二是如何将民俗学社会应用化，使之能对现实社会有用，能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钟敬文先生早年已有将民俗学与文化学和文化史综合研究的倾向，在民俗学真正获得发展后，他再次引入了文化学。1992年，他发表文章《民俗文化学发凡》，为民俗学量身定做了“民俗文化”的内涵外延，并称这门学问为“民俗文化学”，这对民俗学站稳学科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对“民俗文化学”的性质，连树声在《〈民俗学说苑〉编后记》中指出，它是一门新学问。他将钟先生的毕生学说分为三部分，一是民俗学，二是民间文艺学，三是民俗文化学的新概念和新理论¹。钟先生本人将“民俗文化学”界定为“是民俗学与文化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学科”²。当然，对民俗文化学的位置和作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而连树声的理解是符合钟先生本人的初衷的。钟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传统文化随想》中，也曾对民俗文化学的历史价值做了有针对性和有未来目标的阐述³。

从新学科上说，民俗文化学的成立，要有自己的对象特点和学科性质，

1 连树声：《〈民俗学说苑〉编后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25—27页。

2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第2页。

3 钟敬文：《传统文化随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25—29页。

而在这方面，民俗文化学与民俗学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¹。所以，民俗文化学的成立，给了民俗学一种理论延伸和方法支撑。它使民俗学能从文化现象的角度分析民俗，能用文化分层的方法，划分民俗事象。它还能使民俗学接受以往所不接受的部分研究对象，如在上层文化中的民俗、手工技术文化中的民俗等，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有了文化这个大平台，民俗学的发展就活了，路子就宽了。如此我们也好理解钟先生的另一句话：“民族文化的涵盖面当然大于民俗文化。”²他还有一篇文章《五十年来民间传承文化研究的新收获》，讨论了在学科群中，民俗学既保持特色又开展跨学科研究和综合性研究的可能性³。

总之，钟敬文先生提出的民俗文化学，放在他的民俗学大框架内，才能产生学理上的合理性。有了民俗文化学，民俗学就能从其依赖的文化制度和文化政策上，突破不少禁区，达到以往民俗学研究的死角。只要承认文化的民俗学是一门科学，就可以把这类民俗作为文化现象重新加以解释，对从前讳谈的“迷信”、“落后”、“民间宗教”等问题，现在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民俗学还可以关注一些具有深厚传统的文化事象的现实活动，把死学问做得鲜活。从文化学的视角切入，民俗学能够介入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的分层研究和交叉研究，从中下层文化的层面，可以从容地进行资料重构、个案描述和理论颠覆。现在我们看钟先生在《民俗文化学》中所讲的“民俗文化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很受用⁴。

钟敬文先生对民俗学通过民俗文化学加强现实社会意义的论述，最精彩的，是在该文的“民俗文化学的效用”一节中，他说：“民俗文化学的效应，概括地讲，有两方面：一是保存现有的民俗遗产。……二是研究民俗、认识国情（包括广大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在内），以利脚踏实地参与现实改革。”⁵现

1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第3—5页。

2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第5页。

3 钟敬文：《五十年来民间传承文化研究的新收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5—9页。

4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第6—7页。

5 同上，第11—12页。

在我们应该更能够理解他的用意。这样一来，在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群中，民俗学就能通过民俗文化学，产生应有的社会效能，我们对民俗学的建设迫切性的关心，也会大于追问民俗文化学的学理本身。民俗文化学的出现使民俗学成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中的很有弹性的学科。

三、民俗学科建设调研的目标、方法与过程

经国务院学位办委托，本次工作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进行，我本人忝任负责人，组织同仁共同奋战。我们在工作中体会到，14年来，国内院校的民俗学科建设在上述理论系统和整体工作框架内进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民俗学科也遇到了发展中的问题，如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民俗文化整体研究和跨文化交流的倾向，使民俗学与艺术学、对外汉语教学、文化遗产学和旅游学等活泼地交叉，但这样一来，民俗学未免帽大体小，急需发展新的研究分支来补充。此外，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一直在研究生层面上招生，与越来越宽泛的本科生报考需求形成不适应，很多问题在同行中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需要比较准确地说出瓶颈究竟在哪里，学科教育的缺口到了什么程度，大家又心中无数，因此需要开展调查。

刘魁立先生在近年主持中国民俗学会工作期间，已对国内院校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学科点设置做过资料搜集¹，这是十分必要的工作。本次调查的重点，主要是充分考虑教育部学科体制下的新一轮民俗学科编目的要求，同时要考虑

1 2009年刘魁立先生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期间，曾在会内组织人力调查并撰写《高校和科研院所部分民俗学专业和教学点分布状况》，据此资料，“目前我国有54所高校与研究机构有招收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或方向〕，其中17所高校与研究机构设有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博士点〔或方向〕，37所高校设有硕士点”。资料来源为“中国民俗学网、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相关高校研究生院网站”。此报告还注明“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南大学等几所大学有民俗学硕士点或社会学下的民俗学方向，但没有在这些高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查到”。刘先生曾托同事用电子邮件将此报告转我，PDF文件，6页。此报告所提供信息除了网站，似与中国民俗学会与高校相联系的工作有关，尚未及按照有关部委学科建设体制进行网络信息分类，对民俗学科的实际建设状况也有待调查。但这份资料作为中国民俗学会首例进行的民俗学科建设调查的眼光和意义是不容忽略。